

参 考 信 息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16 期 (总 69 期) 2007 年 12 月 20 日

重学兴教 彪炳史册

——常州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举要

编者按：常州自古文风兴盛，文人骚客层出不穷。他们文才斐然，星汉灿烂，正应了邑人赵翼的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春秋时期，季札礼贤让国、归隐延陵，“延陵世泽，让国家风”成为千古美谈。至齐梁，萧统编选了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整理、归纳和总结了梁以前七八百年间的文学作品。名代的唐顺之编立《文编》，正式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清代的张惠言与张琦合编《词选》为中国词学正本清源，“毗陵前后七子”创作的清新的诗文，记录着一城平民的高唱低吟。浓郁的诗词情怀，使常州人千百年来一直富有诗意地生活，蕴构成“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流水，笔下有平仄”的独特风景。赵翼在史学研究中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成为清代研究二十四史的大家。常州学派的“经世致用”说导源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浪潮，“改制说”导源了十九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直致后来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在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常州走出了一生从事洋务被称为“天下第一官商”的盛宣怀；走出了以医报国、悬壶济世的孟河医派；也走出了一生为民主奔走呼号的史良、李公朴；更走出了以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为代表的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新中国前仆后继、奋斗终身。正是他们为今天的盛世中华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这些历史名人使常州的自然景观、人文精神、文化渊源、城市底蕴不再是一个空泛虚化的符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支撑着、印证着、感动着、张扬着……它可以成为了解常州文化的门径，沟通五湖四海朋友的桥梁，提高市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人文素质的乡土教材。并籍此宏扬其所承载的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继往开来，续写常州在新时代下的新辉煌。作为生活和工作在常州的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的广大教职工，不能不为生活工作在这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而感到自豪。何况，在这些历史文化名人中更不乏办教育的大家和名家。他们的办学思想、理念和实践等，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为此，我们选编了近二十位教育家的教育生涯片段，供领导和同志们学习参考。

目 录

- | | |
|-------------------------|----------------------------|
| 1. 洋务中坚 实业巨子 —— 盛宣怀(2) | 10. 中国文学先驱 —— 陈衡哲(7) |
| 2. 近代史学大家 —— 屠寄(2) | 11. “汉语言学家” —— 赵元任(7) |
| 3. 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 —— 吴稚晖(3) | 12. 中国现代影剧先驱 —— 洪深(8) |
| 4. 博施济众 —— 丁甘人(3) | 13. 民众教育家 —— 孟宪承(8) |
| 5. 教育改革先驱 —— 张鹤龄(4) | 14. 一代画坛宗师 —— 刘海粟(9) |
| 6. 爱国学者 —— 蒋维乔(4) | 15. 民主斗士 —— 李公朴(9) |
| 7. 生活教育倡导者 —— 屠元博(5) | 16. 音乐教育家 —— 吴伯超(10) |
| 8. 史学大师 —— 吕思勉(6) | 17. 中华预防医学会资深会员 —— 陈志潜(11) |
| 9. 清华大学校长 —— 梅贻琦(6) | |

1. 洋务中坚 实业巨子 ——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止叟、补楼等。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他是足以影响当时中国经济命脉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盛宣怀考中秀才三次乡试不第。当时，中国社会经鸦片战争后，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列强借助“船坚炮利”，轰炸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军事入侵，外国资本也大量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引发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样，历史给了盛宣怀一个人生新机遇，即办洋务大事，创建中国近代企业，走“求富”、“自强”的道路。1870年，经杨宗濂介绍，盛宣怀进了他父亲的世交、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在官场，盛宣怀只是隐藏在清末名臣李鸿章深厚的幕僚，最高的官职也不过是个邮政大臣，这个官也是当了短短几个月。但是，盛宣怀在清朝晚期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李鸿章。盛宣怀办洋务30年，创下了11个“第一”：第一个商本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在山东创办了第一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个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钢铁厂矿公司；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上海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虽然已经富可敌国，这位中国的“实业之父”，在内心中仍然秉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意识形态”，盛宣怀在大办实体的同时，也是国学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盛宣怀精通“官法”、“商业”、“洋务”，充分发挥“官”、“商”之长，很快从一个洋务官吏转化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实业家。他一人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众多洋务企业，号称“天下第一官商”。

（摘自：《江山代有才人出》武进名贤/2007.12）

2. 近代史学大家——屠寄

屠寄（1856—1921），原名夔，字敬山，又字静山、归甫、师虞，号结一宦主人，晚号无闷居士。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国史馆总纂等职。是中国近代史学家、教育家。

屠寄自幼聪颖好学，19岁考中秀才，27岁到北京教读，虽然收入微薄，但可以寄些钱回乡，贴补家用，自己竭力节省，用以买书，或借书抄书，刻苦自学。到30岁秋闱又举行，按例应回乡应试，但他既无川资也无时间，只得入籍顺天府大兴县，并改屠夔为屠寄，居然一试中榜，成了举人。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屠寄赴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后以二甲十名朝考一等取，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后，屠寄思想转向开明与通达，主张译洋书、兴教育、开发民智。

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复校，屠寄与张篔甫、严复、辜鸿铭、孙诒让等海内名士均受聘前往任教，屠寄任史地正教习，兼教国文，并编写了一部《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1904年，屠寄被调任奉天大学堂总教习。1905年被解职，调任浙江淳安县知县。1908年辞职后赴南京两江总督端方处任幕僚。1909年受张謇之聘，任南通国立专修馆长。

屠寄于辛亥革命前回到常州，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曾被公举为武阳教育会会长、农会会长。他团结组织各界进步人士，与其儿子屠宽（同盟会会员、时任常州府中学堂学监）一起为常州光复出力。光复后，屠寄被推任武进县民政长，努力为地方兴办学校，调整赋税，禁止烟赌，兴利除弊。

屠寄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地学科方面，最大成就在史学。他从1898年开始编著《蒙兀儿史记》，历时20余年，至作者去世，尚未完稿，后由其三子孝实、四子孝宦相继编著完稿。屠寄耗毕生精力写出的这部历史著作，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历史巨著。

屠寄不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地理学”是近代才形成的教学新学科。据屠寄记述，直至光绪年间“国家兴立学校，颁发章程，自小学至中学，列地理一门于普通必备之学科中……然此学教科之官书尚未编定”。为此，屠寄便以“承乏大学堂教员讲授”资格和“足

迹半中国”之经历，精心编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填补了我国地理学教科书的空白。这也是研究我国历史、特别是清代社会和地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摘自：《古今武进籍百家名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3. 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吴稚晖

吴稚晖（1865—1953），原名眺，后改敬恒，小字奇龄。光绪十七年中举，曾任上海南洋公学学、上海过于师范学院校长、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被联合国文教组理事会列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

吴稚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深知国家贫穷落后，思想闭塞，人才奇缺，急需学习新知，培养人才。根据他在英法侨居9年之体会，认为要改良国人人心智，走工业救国道路，必须对西方的教育科技文化多作研究与体认，方能振兴中华。1912年，他与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在法国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主张招收国内有志青年学生到海外勤工俭学。勤工俭学会由吴稚晖任总监，统筹其事。为了招收更多青年学生赴法学习深造，吴稚晖与李煜瀛等人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任校长，蔡元培任中法大学协会中国会长，另设法国校长和法国会长。中法大学实为学生宿舍兼法文补习所，中国学生在这里学习法文能达到会听会写的程度，就可凭驻法大使馆签证之后进入法国里昂大学之文、理、法、医或其他专门学校上课。10余年间，中国数千有志青年不断去法国勤工俭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留法青年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不少有志青年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蔡畅、向警予、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李立三、李维汉等人。应该说，吴稚晖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吴稚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倡导和推广国语。1913年1月13日，吴稚晖应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出任国语统一会会长，推进全国国语读音统一工作。当年2月，他召集全国文字、音韵、语言的权威人士开会，制定“注音字母”一套，并审定6500余字之国音。1917年7月，教育总长范源廉拨出专款，约请吴稚晖继续编印国音字典。他以渊博的学识，厚实的文字音韵修养，参照国际音标及发音原理，依《康熙字典》部首排列顺序，编制出《国音字典》，合计为1300多字，后来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国音字典》。同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后改为注音符号）。为了训练推行国语读音统一工作的人才，吴稚晖于1924年在上海创办国语师范学校，亲任校长，兼教《国语概论》。其办学宗旨就是培养造就国语教学人才，为在全国推广国语创造师资条件。吴稚晖还主持编印了《汉语注音表和注音符号歌》，审定《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等书籍。由于吴稚晖在致力于国语读音统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不少教辅人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就掀起了学习国语的热潮，这对后来的普通教育和全国语言逐步趋向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62年，吴稚晖被联合国文教组理事会推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

（摘自：《古今武进籍百家名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4. 博施济众——丁甘人

丁甘人（1865—1962），名泽周，又名甘人。孟河医派集大成者，中国第一所中医学校创办者。

在20世纪初，中医界多以私人传授医术，对某些医药良方，只传子孙，对外秘而不宣，这种授徒家传方式使中医不能得到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尤其是当北洋军阀拒中医教育于教育法令之外时，更促使中医界有识之士奋起办学予以抵制。为此，热心于培养中医人才的丁甘仁，于1916年联络中医界同仁夏应堂、谢观等人首树一帜，在上海南市石皮弄创办中医专门学校（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和女子中医专校，自任总主任，主持校务。当时，他创办的专门学校为四年制，章程规定凡高中毕业和同等学历者都可报名，经考试后择优录取。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开设的课程有：中医学史、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本草学、脉学、儿科学、温病学、方剂学、妇科学、外科学等，后来改为中医学院后，又增设解剖学及中医诊断课等。为了让学生学习有关临床及中药验方知识，还在南市学校

创办附属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设门诊及住院部，供学生见习、实习之用，将教学、临床有机结合起来。随着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他又联络中医界同仁，发起成立了中国中医学会，并任会长，经常组织开展中医学学术切磋交流活动，并创办《国医杂志》，作为中医理论的交流阵地，培养了一大批中医方面的专门人才，如陈存仁、王慎轩、朱治安、许半龙、秦伯未、程门雪、沈石顽、张赞臣、严苍山、章次公、黄文东等，均一代名医，程门雪还出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丁甘仁的儿子元彦（字仲英）、元春（字涵人）、孙子彬臣（字济万）、彬章（字济华）、彬刚（字济民）、彬毅（字济南）等，均秉承家业，发扬光大。

（摘自：《古今武进籍百家名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5. 教育改革先驱——张鹤龄

张鹤龄(1867-1908)，字长孺，号啸圃。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任户部主事，后任湖南督粮道和按察使、奉天提督学政等职。中国教育改革和文字改革先驱。

1898年实施“戊戌变法”，张鹤龄积极主张革新变法，并撰写了《变法经纬公例论》。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百熙看了这部论著，大加赞赏，评为“名言精理，博大宏深，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世豪杰”之论。张百熙当时正主持京师大学堂事务，他很快奏请朝廷，聘任张鹤龄又于1903年受命起草《学务纲要》、（通称《奏定学堂章程》），由于张百熙、张之洞等大臣向清廷奏准颁布全国，从此，各地新式学堂陆续开办来。后应湖南巡抚赵尔巽的邀请，张鹤龄调湖南任督粮道和按察使等职。当时湘抚属官，实行藩台与臬台的两司制，教育事业由按察使（臬台）兼管。张鹤龄对办学事务亲自规划和布置，湖南的新学堂发展很快。赵尔巽说：“湖南之兴学，莫盛于此时。”

1906年4月，张鹤龄又被调任奉天提督学政。当时的奉天，由于日俄战乱，呈满目疮痍景象，加之边塞关外，文化落后，教育师资尤为缺乏。张鹤龄任奉天提督学政后，首先重视培养教育师资，到关内聘请有教学经验的学者赴奉讲学，同时筹办师范简易学堂、师范简易科、师范专习所和体操专修科等教学机构。这些简易师范生经学部考核验收，成绩较好，受到学部嘉奖而传示全国。接着，张鹤龄又陆续创办了格致测算专修科、实验学堂、省立中学堂、商业学堂以及省城图书馆等。这位张学台对图书事业尤为关注，他专拨巨款，在沈阳大南门建筑新图书馆，派人到关内采购大量西洋现代科学书籍。张鹤龄又成立了省教育会，督促各州县设立劝学所，鼓励私人捐款办学。据记载，张鹤龄初至关外时，奉天仅数十校舍，且破敝败落，到1908年底，全省各类学堂已增至2122所，在校学生达8.5万人。张鹤龄在东北办学，真可谓费尽心机，各项学务诸如学堂规章、课程设置等，他无不躬亲过问。由于终日忙碌、劳累过度，他积劳成疾，仍抱病批览下属的视学报告，还召集各处绅士商量办学事宜。至1908年9月，他病势转危，盎然长逝，年仅42岁。他为振兴东北的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据说奉天人谈及张学台无不流泪悲恸，若失所依，哭吊者接踵于灵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曾有“天下言贤学使皆曰张公”的结论。噩耗传到常州，故乡人亦为之哀伤唏嘘，他的灵柩葬于武进安西乡。

张鹤龄治学务实、博览群书，见识广泛。他不仅主张教育要改革，而且对我古古代文字难以推广的弊害，也作了精辟的阐述。早在100多年前，张鹤龄就写过一篇论文字改革的专著《文敝篇》，主要阐述了中国文字必须改革的理论，在研究中国文字学的论坛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60年，文字改革出版社曾将其印成单行本出版，吴玉章在序页上写道：“陈老叔通把他故友张鹤龄所著《变法经纬公例论》中的《文敝篇》送给我，读了以后，觉得在60年前，便能痛陈文字繁难之弊害，而主张改革文字，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摘自：《古今武进籍百家名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6. 爱国学者——蒋维乔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自号因是子。曾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上海光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著名教育家哲学家。

蒋维乔积极主张“救国之本还在教育”，认为办教育“应以编辑教科书”着手。从1903年下半年开始，经蔡元培引荐，蒋维乔被上海商务印书馆聘为常任编辑，花10年时间研究编辑小学教科书。他

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等编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未及数月，行销10万余册。以后又合编了《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8册、《简明国文教科书》8册、《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8册、《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4册。为了便于教师授课，蒋维乔等又编写了《最新初小教科书教授法》，该书“行销之广，几并于《教科书》”。随着这些教科书面世，小学教员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蒋维乔又提议和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理化讲习所和博物讲习所。他还研究了教育、心理、论理学等知识。1905年6月，他又提议并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每半年一期，开设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课程。还开设了教育法、心理学、音乐体育、学校管理法等课程，分别聘名家任课，如蔡元培讲哲学，杜亚泉教化学，蒋自己讲心理学、教授法、伦理学等课。蒋维乔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1910年又编著出版了《学校管理法》，191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与日本友人长屋慎太郎合著的《心理学讲义》一书。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则邀请蒋维乔参加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的筹建工作，并担任秘书长，拟订并颁行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订办法》14条。政府北迁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提议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并决议要案13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划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等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开创了民国教育的新纪元”。1913年，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看不惯汪的官僚作风，因意见不合，辞职南归，重返商务印书馆工作，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内阁改组，新任教育总长范源镰邀请蒋维乔到教育部任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1922年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1927年3月起定居上海，致力于著述。1929年起，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从教20余年，先后任哲学系、中文系教授。1937年8月出任正风文学院院长，并讲授中国哲学史、庄子2门课，还受黄炎培之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馆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在沪复校，73岁的蒋维乔任该校教务长，并兼文学院院长及中文系主任，次年又兼《人文月刊》社社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77岁的蒋维乔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苏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常任副主席。随后，苏南区又委他为参事。从此，他逐渐摆脱了繁重的教学和行政事务，将主要精力用到著述上。1951年曾回故乡任武进文献社副社长。

（摘自：《古今武进籍百家名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7. 生活教育倡导者——屠元博

屠元博（1880——1918），1907年，28岁的屠元博受家乡之聘，出任常州附中学堂监督，拉开了省常中百年名校的序幕。

屠元博生于1880年，出身常州名门，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屠寄的长子。屠元博名宽，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出任附中学堂监督后，屠元博将民主、革新的理念应用到教育实践中，为学校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屠元博爱才惜才，不仅延聘了吕思勉、童伯章、史国干、刘伯能等一批名师，对学生也关爱有加。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自己当年十分调皮，有一次熄灯后与同学在宿舍内聊天，舍监陈士辛巡察时生气地说：“爱语者可至舍监室与我语：。钱穆果真披衣下床，悄悄跟到舍监室，陈士辛苦笑不得。钱穆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但屠元博总是悉心维护。

后来钱穆与同学一起要求退学，屠元博说退学要填申请，钱穆马上填了申请，屠元博说申请表不合规范，钱穆“大声请当以何等样式填写”。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如此要挟校长，钱穆回忆时每称“年幼无知”，但屠元博不以为，专门写信给钱穆的哥哥钱挚，让钱穆申请复学，复学不成后，又助其转学南京钟英中学。

钱挚是钱伟长的父亲，与钱穆同年考入附中学堂师范班。屠元博觉得人才可惜，希望他转入普通班以求深造，得知其家贫条件不允许，立即给他安排了勤工俭学的职位。

附中学堂招考时，气氛还“类科举”，但屠元博思想开明，翌年即开设课余游艺会，培养学生音乐、美术、军事等各方面技能，屠元博因此被誉为“生活教育倡导者”。同时，屠元博还教育学生关心

国事，追求民主，附中学堂成为常州辛亥革命的中心。省常中日后能走出钱穆、刘天华、瞿秋白等各领千秋的英才，与屠元博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

（摘自：《古今武进籍百家名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8. 史学大师——吕思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程芸、弩牛等。中国著名史学家。

吕思勉家学渊源深厚，十几岁就博览群书，精熟史籍，然后将史料进行综合考核，相互参证，酿成新说，写下了大量的史札和史论，形成了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密严谨的学风和文风，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长期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从1905年就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最初在1907年11月，常州附中学堂创办，吕思勉应监督（校长）屠宽（元博）之聘，任历史、地理教师。初来任教时，还只有24岁，在教师中年纪是最轻的。1910年经屠寄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任教。1912年到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和商业地理。1914年7月，去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其间写了许多通俗性的历史、地理读物，如《国耻小史》、《中国地理大势》等。1919年，经谢观介绍，吕思勉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参与编纂《中国医学词典》一书。1920年1月，被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教授，主要讲授国文，其间写成了他的成名之作《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这是我古第一部白话本的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通史著作。1926年9月，他进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上海光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每周上课10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10余门课。除1931年到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光华大学停办，他携眷归乡闭户著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又重返光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大专院系一级教授，兼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也许因为既是历史老师，又是地理老师的缘故，吕思勉讲授的地理课，不仅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内容，而且包括历史地理的知识；讲授的历史课，自然也免不了融合地理知识。这一点给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的治学，颇为注意历史地理的考证。也因此，虽然钱穆在史学界的名声远远超过老师（被海外的史学界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但他始终尊吕思勉为良师，恭恭敬敬执弟子之礼。

（摘自：《武进名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9.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1926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改制后首任教务长，时年37岁。年富力强的他出任教务长后，全面进行革新整顿，将大学部设立17个系科，引进美国学分制，制订新的《教学大纲》，将全校教师按学历、学力及专长统一配属各系，使清华由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演进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不久，他被任命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全美的清华留学生。他把监督处办成了温馨活跃的留学生之家。

1931年12月，梅贻琦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到任后，坚持“民主治校”的基本理念，身兼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三会主席。在会上，他总是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慎重考虑，决不轻易表态，使会议所作决定在公开、公正、透明的前提下保证其科学性和民主性，从而增强了清华的凝聚力。他根据社会发展所需，创建了著名的清华工学院，在原有土木工程系基础上，增设机械、电机两系，创办了航空、无线电、金属等研究所，以及《机工季刊》、《工程季刊》等学术刊物，修建了航空工程馆、机械工程馆和电机工程馆，使清华工学院在创建之初，就站在世界工程技术前列，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优秀工程技术人才。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先迁湖南长沙，次年再迁云南昆明，

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联大常委会”，由他任主席。数月后，张、蒋两人先后去重庆任职，联大便由他一人支撑。梅校长团结三校师生在西南边陲，平地起家，艰苦创业。在敌机轰炸、物资设备有限、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使学校规模渐次增至 5 个学院、26 个系，在校学生 3000 人以上。在他的领导下，西南联大的教学始终井然有序，教学质量之高，堪称战时奇迹，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如扬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唐敖庆、林骅等。许多教师在艰苦卓绝的境况下，在教育人的同时，又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

梅贻琦拥有丰富而科学的教育思想，这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财富。他始终积极倡导通才教育理念，从德、智、体、群、美诸方面培养人、教育人，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他的德育观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方面，使学生知道如何做人，既要有吃苦耐劳精神，又有追求真理之志向。他的智育观，着重于严谨的学风建设和学术自由两个中心环节，并使学生“学文者通理，学理者通文，学识渊博，知识全面，决不囿于某种学科、某专业，从而使学生素质全面得以提升”。他还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在国内大学中绝无仅有，他认为体育应搞各种运动，促进生理上的健康，训练身体各部的合作，并使个性有适当表现，同时养成良好品性。他还认为“体育主旨不在练成精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借团体运动的机会，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梅贻琦的群育和美育思想亦占重要位置，旨在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团队合作精神，还要求在文学与艺术多方面的熏陶下，使学生具有更高的审美品位和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摘自：《江山代有才人出》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2007.9）

10. 中国新文学先驱——陈衡哲

陈衡哲（1890—1976），女，原名陈鹏，字乙睇，笔名莎菲。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中国新文学先驱之一。

陈衡哲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1917 年，当胡适、陈独秀振臂高呼文学革命时，首先响应拿笔写白话小说的作家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是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女作家。

陈衡哲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对学校教育发出了“救救中学生”的紧急呼吁。她认为“担负着读书重任的中学生所受的威胁，是康健的摧残，及因此引起民族衰落。”她曾说：“整天上课，一大堆课余作业，星期天的休息、娱乐没有了，得不道充分的睡眠，摧残了康健，摧残了活泼的生气和好奇心，妨碍了他的美术、音乐的天才发展。”她还认为：“振兴民族首先得强健青少年体魄。手、脑训练同样重要。要加强理智和感情的修养。爱，除了两性和家庭以外，还要升华到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讲到人格修养，她认为：“没有比孟老夫子的三句话说得更为切实、更为高明了。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再替他加上一句，‘大名不能惑’，因为为了求名的缘故，一个人把他的人格堕落的，也未尝没有。要做到这‘四不’，根本在于忘我。‘鸛鷓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能把它作为个人物质生活的金科玉律，人格还能不向上，国耻还能不洗刷吗！”

（摘自：《江山代有才人出》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2007.9）

11. “汉语言学家——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号重远。国际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中国现代语言学一代宗师。

赵元任博学多才，尤以语言学方面的成绩蜚声中外。他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十分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现代科技与语言研究结合起来，在语言理论、汉语语音、汉语方言、汉语语法等领域均有建树，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论著，在国际语言学界负有盛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长期致力于推行国语工作，1922 年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1935 年出版《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在推行国语工作上起了示范作用。他 1920 年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1923 年起先后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汉语拼音化的文章，并主持制订了《国语罗马字》（后定为“注音字母第二式”）。1935 年，他又参加了“国语推行委员会”，为民族语言规范化和汉语

拼音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赵元任还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他在清华园任教时，每周有个同乐会，师生都参加。他的表演总是精彩绝伦。有一次，他在会上收取 10 多个茶杯，敲打调音后，居然奏出一支乐曲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 132 首歌曲，为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四”时期创作的《新诗歌集》在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海韵》（徐志摩词）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词），风行了半个多世纪，当北京大学 100 周年校庆时再次被演唱，受到热烈欢迎。这首 20 年代最为流行的歌曲已成为中国百年经典歌曲之一。

（摘自：《江山代有才人出》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2007.9）

12. 中国现代影剧先驱——洪深

洪深（1894——1955），学名达，小名七斤，字伯骏，号潜斋、浅哉。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等职。杰出的戏剧家，我国现代影剧事业奠基人。

洪深自幼爱看戏，进入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后，对当时风行的时事新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2 年考入清华学校后，更是经常粉墨登场。1916 年 8 月赴美公费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瓷工程。因为他当时热衷于实业救国，立志发愤读书，后来遭遇了家庭变故和人生挫折，又看到国内政局混乱，决定改学戏剧，做中国的易卜生，以唤醒民众，改造社会。于是，洪深成了哈佛大学贝克教授唯一的中国戏剧硕士生，也是最早专业学习戏剧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期间，他还学习发音、表演和跳舞，学习表演艺术理论，学习剧院营业管理，并随职业剧团到纽约各地演出实习。学习期间，他创作了英文剧《虹》，与张彭春合作写出了《木兰从军》，为他今后从事戏剧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2 年，洪深从美国带着一整套西方舞台艺术演出体系学习成果回国了，先后在沪商、学界任职，曾参与领导“复旦剧社”、“戏剧协社”，并参加了“难国社”，对我国现代话剧和剧场美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根据早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利用假日到附近农村访贫问苦积累的生活素材，写出了我国话剧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剧本《贫民惨剧》。后来，洪深又进入了电影界，从国外引进了有声电影技术，并编导了《早生贵子》等数十部电影，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抗战期间，洪深积极从事戏剧界抗日救亡运动，1942 年底，重庆剧影界庆祝洪深五十寿辰，欧阳予倩赠诗道：“一行精严破万才，传香何惜返魂灰。低回五十年来事，都讳高深号浅哉。”郭沫若更称他是“艺术界的完人”洪深在祝寿会上自谦地表示：“剧影艺术事业是一桩极有意义的工作，即使只能胜任一位二三等的戏剧家，也仍然是值得的。”他曾对郭老说：“人总是要过去的，而事业对人类的贡献是永生的！”

洪深是一位开拓我国影剧新风的勇士。他创作了中国艺术史上第一部话剧本《贫民惨剧》和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在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中，首创男女同台演出新风。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电影学校——中华电影学校。在《歌女红牡丹》中，第一个进行有声电影的实践，使中国电影与世界同步进入有声时代。

（摘自：《江山代有才人出》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2007.9）

13. 民众教育家——孟宪承

孟宪承（1894——1967），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一级教授，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

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他最大成就就是开创了我国民众教育之先河。他在《民众教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解释说，民众就是工农大众，是全国人民中的大多数，搞教育，就要面向大多数，使大多数人能识字，有文化，有知识。这样，中华才能有望，才能振兴。如果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工农大众不识字，没文化，中国就会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就会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他明确指出了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发展民众教育。为此，他做在浙江大学任职期间，于杭州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和民众教育馆，他躬亲教务，总结办学经验，发表了学多文章。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担任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校长时，在办好高等教育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办好函授教育和广播教学，进一步扩大民众教育。他制订了《华东师范大学分科结业》制函授学习，扩大了教育面，为基层培养和提高师资队伍教学水平提供了新的学习机遇。

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新的办学思想。他认为：“大学是最高学府，应包括知识的创获、品性的润溶和民族社会的发展。”他强调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让学生掌握坚实、广博的基础知识，因此，不宜过早分专业，同时还要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他在教学方法上，要求培养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都事先制订了严密的计划，不随意抓课题，不随便发感想，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育。要求学生认真研读原著，在学术上讲民主，真正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精通英语、法语，晚年还系统地学习俄语，运用多种外语和渊博的知识，精心研究中外教育理论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受中外学者和专家的推崇和尊敬。

14. 一代画坛宗师——刘海粟

刘海粟（1896—1994），原名刘，小名盘官、刘九，字季芳，笔名海翁。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华东艺专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画家、书法家、艺术教育家，一代画坛宗师。

1912年，年仅17岁的刘海粟与其画友乌始光、张聿光等一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他长期担任该校校长，以拓荒者的胆略揭开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帷幕。他首倡男女同校，组织旅行写生，提倡师法自然。1915年又首倡人体模特儿写生，志在“谋中国文艺的复兴”。但在当时弥漫着封建气息的土地上根本找不到男女模特，后来找到一名和尚的小男孩，成为中国美术学校第一个裸体模特。1917年，又高薪聘到一位男模特。1920年，请到一位白俄姑娘，她成为美术院校第一女模特。刘海粟因此被斥为“艺术叛徒”、“教育界的孟贼”，遭到许多封建卫道士的责难。但他毫无畏惧，据理力争，借助进步舆论，充分阐述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他的行为得到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沈恩孚、黄炎培等各界著名人士的全力支持。他以非凡艺术气质和对事业的信念，在新旧文化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艺术教育中使用模特儿也从此得到了确认和推广。

当刘海粟在艺术道路上摸索奋进时，有两位师长对他的人生艺术道路给予了很大的影响。一位是康有为，刘海粟的书法家从康有为。另一位是蔡元培，他最早支持刘海粟在上海美专进行教学改革，是他为刘海粟举办第一个画展，并亲自撰文《介绍画家刘海粟》，为之推荐张扬，引起社会关注，尤其是他帮助促进刘海粟到欧洲考察艺术和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这两次欧洲游成为刘海粟人生的重要关口，因此刘海粟生前常说：“世无蔡元培，便无刘海粟”，刘海粟办学也伸手蔡元培先生的影响。他提行“学术自由，兼容并蓄”，躬践“闷的深美”的治学方略，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刘海粟求贤若渴，招揽了许多专家、学者云集于美专。在教育方法上，他强调要尊重个人，注意创造力，使学生的艺术个性能得到充分张扬。在刘海粟的苦心经营下，上海美专成为当时国内知名的艺术学府。

新中国成立后，他毫不犹豫地经营数十年的美专校舍、设备、图书贡献给祖国。他驱车神州，放情山水，用画笔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和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气象，他还多次将作画所得巨款捐献给国家和艺术教育事业。

（摘自：《江山代有才人出》常州市武进区文化局/2007.9）

15. 民主斗士——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原名永祥，号晋祥，后改名公朴，号仆如。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全民通讯社》社长、社会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民主教育》主编、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常委。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和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

李公朴父母早亡，家境贫寒，10岁左右读过私塾，13岁当学徒，虽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仍坚持业余苦读。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公朴受到反帝爱国思想的激励，在镇江发起组织爱国团体，

在报上揭露奸商出售日货的阴谋，使这些奸商受到爱国学生的冲击，他们的日货被烧毁，为此他被店主开除了。后来，李公朴进镇江润州中学和武昌文华大学附中读书。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毕业后升入沪江大学继续攻读。1925年在上海“五卅”运动中参加了罢课游行。1926年到广东参加了北伐军，被派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愤然离开了部队。

1928年8月，李公朴乘轮赴美留学。他在美期间，非常重视社会调查，而且往往与中国比较，对中国的旧有文化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

1930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抗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12月12日，李公朴在上海和沈钧儒、章乃器、钱俊瑞、陶行知等人也发起了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6人，并解往苏州高等法院，羁押于看守所，史良亦于12月30日到苏州投案，另羁押于司前街看守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名流的关切同情，要求当局立予释放。李公朴入狱后，始终正气凛然，充分表现出如他自己在狱中所写“拼其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的崇高精神。在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全国各界人士的营救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国民党政府为抗战爆发后的情势所迫，于7月31日“七君子”交保释放了。

抗日战争期间，李公朴辗转于上海、武汉、太原、延安以及许多抗日根据地之间，为推行战时教育、动员民众而四处奔走。为了实现抗战教育的愿望，李公朴应阎锡山邀请去山西主持民族革命大学，全面管理学校教务。他拟就办学纲领，约请陈唯实、施复亮、贺绿汀、萧军、方仲伯、严希纯等知名人士到民大工作，介绍了许多进步青年到民大学习，使民族革命大学的师生增加到5000多人，其中有不少学生后来去延安参加革命。

1938年12月，李公朴同张曼筠一起经西安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到延安，毛泽东多次接见他，到窑洞来看望李公朴夫妇，并为张曼筠的长城画幅题旧作《清平乐·六盘山》毛主席还就文化教育以及出版工作方面的问题对李公朴做了重要指示，要求把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深入到广大农村和游击根据地。李公朴受到极大鼓舞，当即写信给读书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转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为敌后抗战文化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为了把抗战教育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李公朴打算组建一个“抗战建国教学团”，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于是从抗大、鲁艺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了“即教即学、边教边学”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在李公朴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达晋西北。每到一地都开办短训班，把学校送上门来，宣传抗日，教育民众，受到各地军民的欢迎。

1946年1月，在重庆与陶行知共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主持教政。这是一所面向社会职业青年的夜大学。他倾注大量精力于平民教育，始终围绕民主政治。他深知愚昧是专制的土壤，争取民主，不能光靠几句口号，应予扎实的知识基础，并且要从认识、技术、组织、人格等方面开展系列教育。

1946年7月11日晚10时，李公朴被尾随后面的特务用无声手枪击中了腰部，突然倒地。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于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不幸逝世，年仅44岁。7月16日，昆明各界人士在云南大学至公堂隆重举行李公朴追悼会，毛泽东、朱德联合发来唁电，周恩来、董必武等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发来唁电，全国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知名学者、社会名流以及国际权威人士，纷纷来电来函表示哀悼，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勾当。李公朴是为民主运动而献出生命的，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伟大战士，他激励后人为了民主而努力而斗争。

（摘自：《武进名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

16. 音乐教育家——吴伯超

吴伯超（1903—1949），曾任国立音乐院院长。我国近代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

吴伯超自幼喜好音乐。辛亥革命后入家乡道南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武进县立师范学院，并随国乐大师刘天华修习二胡，过人的天赋与刻苦的学习使他成为刘先生的得意门生。1922年春，刘天华引

领北上，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继续跟随刘天华学习二胡和琵琶，又从俄籍教师学钢琴，同时学习作曲、西洋乐理等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吴伯超从北大音乐传习所毕业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孔德学校任教。不久被聘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助教兼会计，主要教授乐理、二胡及钢琴副科，同时尝试以西式和声、曲式创作国乐，激励音乐学子发展我国音乐。

1931年，吴伯超，获庚子赔款补助赴比利时留学。通过五年留学生活，吴伯超系统地掌握了和声、理论作曲和音乐基础理论，接受了新的音乐思潮，为他日后发展我国音乐和音乐教育打下了基础。

1935年7月，吴伯超学成回国后重回上海音专任教，并在南京担任内政部礼乐编订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吴伯超辗转各地，先后担任过广西政府参议、广西省音乐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国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副主任、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及音乐主任等职。1938年6月，吴伯超在广西桂林主持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培育师资和音乐人才，还创办了合唱团和交响乐团。

在长期的音乐教育实践中，吴伯超深感要发展和提高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必须从儿童音乐教育的基础着手。1945年，吴伯超创办了国立音乐院附设10年制幼年班，招收100多名6至12岁音乐天赋优异的儿童入学。学生来源主要到收留流亡儿童的孤儿院、保育院、难童收养所等处去逐个挑选，发现有音乐感的孩子就带回去，入学后免费教学，供给食宿。吴伯超以慈父般的心怀去关注音乐幼年班的教育。

1947年春，在上海组织的一次音乐比赛上，幼年班学生旗开得胜，拿下了大部分项目的前两名。到解放前夕，幼年班的学生总数已超过100名。吴伯超在国难重重、时局动荡的艰难时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是祖国音乐人才的摇篮。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市军管会接管了幼年班，有的学生参加了解放军文工团，有的参加了地方文工团。1950年春，大部分学生随班迁往天津，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8年迁至北京。幼年班的学生成为新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管弦乐队的中坚力量，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当代著名作曲家兼教授金湘、著名小提琴教授郑石生、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著名作曲家田丰、长笛演奏家李学全、音乐学家毛宇宽、黄晓和等均出自幼年班。该班学生毕业后散布于全国各音乐学院和专业团体，大都各有成就，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摘自：《常州市名人》百度/2007.12）

17. 中华预防医学会资深会员——陈志潜

陈志潜（1903—2000），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重庆大学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卫生杂志》编委、“九三”学社中央顾问等职。

陈志潜从记事起，家里就没有断过重病人，长年累月的药香也未能挽救他生母的生命，姐姐、弟弟、姑姑也长期患病相继夭折。亲人的病痛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悲，为此，他从小就立下“学习医术，治病救人，济世助人”的宏愿。17岁的陈志潜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投考了协和医学院入学考试发榜了，陈志潜竟名列榜首，终于跨进了远东医学最高学府协和医学院的大门。

陈志潜在协和医学院连续三年争得了医学预科奖学金，于1924年顺利升入协和医学院本科学习。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标准建立的。各科教授都是国际知名的权威。对陈志潜影响最大的是公共卫生学主任J·B·兰安生教授。兰安生教授家和实践家。兰安生在教学中对中国农村保健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实行公医制度的设想，使陈之潜在学习期间，结识了当时在北京主办《民生报》的辛亥革命志士陈友仁。受陈友仁的影响，他开始深刻反思社会问题，看到社会卫生环境差，人民大众普遍缺乏卫生常识，各种疾病广为流传，他心忧黎民，心情沉重，与同学扬济时、诸福堂等人，本着“灌输民众医学知识”、“扶助民众健康”的宗旨，于1926年共同组织“丙寅医学社”，先后在北京《世界日报》、《新华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上创办《丙寅医学周刊》，由陈志潜担任周刊主笔。以“提倡医学大众化，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增进民族健康”为宗旨，宣传现代医学常识，促进医学科学化。周刊问世后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欢迎。后来，陈志潜又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农民卫生知识读本，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健康教育专著《健康教育原理》

1929年夏，陈志潜毕业后，在兰安生教授的支持和陶行知先生的感召下，没有留恋城市生活，放弃了留校机会和优厚的待遇，毅然与新婚妻子王文瑾一道到南京社区，在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执教卫生学，成为该校唯一的卫生教师。同时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实验卫生机构“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并兼任实验区主任，立志以其平生所学为人民大众服务。随后，他在余儿岗开设了一个“夫妻卫生所”，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为农民防病治病。他还自编了《农民卫生知识讲义》，给参加夜校的男女农民上卫生课，这对当时的农民卫生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陈志潜认为，国民的健康水平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尊严和盛衰，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因此，普及卫生知识，增强人民体质，搞好卫生保健，开展疾病预防，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卫生事业的首要任务。

陈志潜所创建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组织形式及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作为在全球推广的“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模式。陈志潜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执著地追求，默默地奉献，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的成就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高度重视。

抗战胜利后，陈志潜又以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毅力、非凡的才能、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奉命组建重庆大学医学院。他既在重庆市内聘请到一批学术造诣深、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又大胆招聘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医学院毕业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病理、生理、微生物、解剖学专家，保证了师资力量。陈志潜又赴美国考察了哈佛、康奈尔等著名大学医学院，学习国外医学院办学经验，回国后租用了一栋简易楼房，筹集了一批能使用的医学教学设备，奇迹般地创建了重大医学院，并站稳了脚跟，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摘自：《武进名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